



邓小平理论 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

陈锡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 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

陈锡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重大发展：“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陈锡喜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ISBN 7-5617-3016-0

I. 邓... II. 陈... III.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845 号

邓小平理论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

著 者 陈锡喜

策划组稿 王子奇

责任编辑 王子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晨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8000

书 号 ISBN 7-5617-3016-0 / G·1529

定 价 1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第一章 从邓小平理论确立

为党的指导思想到“七一讲话”的发表

- 一、邓小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2)
- 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 (5)
- 三、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形成的共识 (9)
- 四、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17)

第二章 居安思危：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实践背景

- 一、对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 (27)
- 二、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世情的深刻变化 (36)
- 三、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国情的深刻变化 (52)

第三章 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逻辑必然

- 一、从马克思的建党思想到列宁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建设理论 (72)
- 二、从毛泽东开创的党建“伟大工程”到邓小平的“政
治交代” (77)
- 三、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自身的深刻变化 (87)

第四章 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对真理始终不渝的追求

- 一、中国共产党寻找、揭示和发展真理的 80 年 (97)
- 二、邓小平的第一个“宣言书”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101)
- 三、不断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和坚持三个“一致性” (112)

第五章 “三个代表”思想是

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 一、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前提 (134)
- 二、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 (148)
- 三、把最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159)

第六章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

多样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

-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理论的发展 (169)
- 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 (183)
- 三、分析社会矛盾的思维方式转换 (189)
- 四、建立新的党的领导方式和社会管理模式 (192)

第七章 不断增强党的阶级

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一、政党先进性的标准主要取决于党的纲领和宗旨 (204)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发展	(208)
三、不能简单地以财产多寡作为判断个人先进与否 的标准	(211)
四、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扩大群众基础	(215)

第八章 从严治党:

实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统一

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223)
二、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的领导制度的创新	(231)
三、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236)

第九章 奋斗目标:

新时期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一、我们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243)
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和共产主义最高纲 领的新界定	(248)
三、“三大文明”的基本目标和实现基本目标的基本 政策	(257)
四、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的切入点	(268)

第十章 善于学习:

共产党人永葆生机的优势所在

一、重视学习是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保证	(275)
二、用科学的理论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头脑	(285)
三、端正马克思主义学风,学以致用	(294)
结语	(303)



第一章

从邓小平理论确立 为党的指导思想到 “七一讲话”的发表

◆“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概念的提出,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前提。

◆“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概念的提出,需要解决两大理论问题:其一是它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其二是它的理论内容的完备性。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还在于在实践中全面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思想和“七一讲话”中包含的一系列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世纪之交,无论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还是老百姓的日常语言中,“创新”和“与时俱进”,以较高的频率,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江泽民向全党乃至全民族大声疾呼“创新”,即“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在这三大创新中,江泽民首先强调的是“理论创新”,强调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要“与时俱进”。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理论被全党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党的十六大之前,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再次关注党的基

本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呢？

一、邓小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2002年2月，人们纷纷在以不同形式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五年前的2月19日，那天，一颗巨星坠落，世纪伟人邓小平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离我们而去。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如同20世纪中国第二个伟人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一样，邓小平的溘然长逝，也在12亿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然而，1997年和1976年相比，社会的心态却存在着明显差别。面对邓小平去世这一无情的现实，人们都能冷静而理智，默默地承受巨大的悲哀，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依然充满着信心。城乡秩序井然，生活如常，股市平稳。一位外国观察家如此评论：“中国人痛心而不担心，悲伤而不迷惘。”而在21年前，人们在悲痛之余，深深地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同样是伟人逝世，人们的社会心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人们从这一反差中能悟出什么道理呢？

毛泽东是在“文化大革命”持续到第十个年头去世的。据他本人宣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寻求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然而，十年过去了，毛泽东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来看，十年动乱并没有解决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向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问题。毛泽东去世时，刘少奇早已被迫害致死，周恩来、朱德也先他而逝，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而“四人帮”在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老百姓对此忧心忡忡。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看,长期动乱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被重新拉大,社会矛盾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老百姓对中国向何处去产生了迷惘。

毛泽东没有在组织上解决好领导权的更替问题,又没有在实践上解决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其根子,则在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纲;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以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及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方式是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被概括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尽管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但是在毛泽东去世时、甚至去世后一段时间里,仍然被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高举着。这就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产生“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

1997年邓小平逝世了,中国人民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一信心来源于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来源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方面看,是形成了具有驾驭国内外复杂局势能力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胸襟和远见,带头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从党的十三大起,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顾问委员会工作,1989年11月又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过8年来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已被证明是成熟的、坚强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集体,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看,是为我们奠定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扎实基础。邓小平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为中华民族振兴描绘了宏伟蓝图,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人民群众从实践中切实感受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中国生机勃勃,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邓小平已为我们制定出下一世纪50年的发展目标,人民群众对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充满了信心。

而邓小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则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有了这一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中把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1997 年邓小平逝世,使中国又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不仅中国人民万分关注这一问题,而且它也引起了国际上各种猜测和注意,不少人担心中国的走向,甚至有人希望中国转向。在这个关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怎样对待邓小平的遗产,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是年,适逢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党的十五大明确地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党的十五大反映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正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

要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首先要在理论上形成一个科学概念。一般来说,作为最基本的理论概念,是对客观世界以及人们实践活动的反映,是人们经过多次实践的反复,在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的形成,又将为人们新的实践提供全新的思维规范。“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既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成果进行概括的过程,又是为回答新的矛盾、指导新的实践而向全党提供新的思想规范的过程。

“邓小平理论”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如下过程: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1982 年中共十二大,邓

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党的报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1992年中共十四大,党的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直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党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形成“邓小平理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既有对每一阶段实践经验进行概括的必然性,又有对新的实践提供新的思维规范的必要性。

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中心工作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邓小平1979年初在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实践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包含了对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的反思,开始在思维方式上调整人们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规范下,人们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重新认识,并最终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从1979年起,在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践上,中国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这一改革实践的推广,在很短的时间里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城市企业进行了下放经营自主权改革的试点,并试办了经济特区。在政治体制上,逐步实行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

但是,1979年开始的这一改革试验,遇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责难。面对这一困惑,邓小平于1980年4月提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再认识的任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后 30 多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 1979 年以来三年的实践经验，初步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要点。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而使新理论的主题凸现出来，并用以规范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道路。

中共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方位展开。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当然，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的方针。1986 年底学潮平息后，针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存在的“左”和右两种思潮，党中央明确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二大以来，还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理论，以这两个理论为立论根据，中共十三大正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明确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对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 12 个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观点作了概括，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拓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升为“理论”，表明我们已开始走出单纯经验摸索的阶段，对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所应走的路，有了明确的路线和理论，回击了改革开放没有理论指引的责难。

中共十三大以后,我们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面对这场考验,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又重新掀起。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国际风波中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了新的发展,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和成功的;另一方面,为回答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质疑,根据对1980年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对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和市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新的、透彻的概括和阐发。据此,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称他为创立这一理论“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并且第一次把这一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作出了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强调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出版。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党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1995年中宣部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纲要》,又提出了这一理论是“科学体系”的结论。这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达成了如下的共识:这一理论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思想。

1997年2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去世,全党更需要有高举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为邓小平所开创的事业和确定的发展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新的矛盾和困难。面对新的挑战,是继续高举这一理论的旗帜,还是改弦易辙,人们的思想不能说都是统一的。于是,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使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更为规范,更有助于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意识。

“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概念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将这一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的理论逻辑问题,而且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同五年前的十四大相比,大大深化了。

三、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形成的共识

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后,人们在称呼“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除正式宣传的场合,大都使用了不同的简称,较为流行的是“特色理论”或“中特理论”,也有简称为“邓小平理论”的(由笔者主编,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本有关的大学公共政治课教材,书名就是《邓小平理论概论》)。那时虽然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简称,但没有对这一名词作严格的论证,因此并不能认为当年使用了这一简称,就已经是把它作为科学概念来对待了。

也有一些同志对于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还不能说是完全相等的概念,其理由是,要用“邓小平”的名字来命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论证:第一,这一理论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第二,这一理论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

第一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因为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始于毛,成于邓”,或者说“毛泽东写了上篇,邓小平写了下篇”,现在把这一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是否意味着,这一理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已经相对独立于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因为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现在把这一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是否意味着,这一理论无论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学上,都对马克思主义有重大的发展。

上述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定位。从学理上看来,“简称之争”的背后,反映了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

用伟人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理论确实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理

论产生了新的飞跃,从而显示出它的相对独立的地位。邓小平理论能否作为科学概念确立起来,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一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即它是否只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列宁主义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的时代的产物。列宁对这一新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政治概括,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他认为,由于20世纪初电气化和内燃机化的技术革命,以及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新老帝国主义之间必然会因实力的消长而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利益,从而必然导致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可促成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即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在比较落后的一国首先胜利。据此,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而不是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力量、革命动力、对象、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从而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来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接着又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探索,其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